

北京文史资料

第64辑



▲记1950-1965年的中华书局

▲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先生

▲我在「老车行」的经历

▲寿石工与寿星墨

北京文史资料

第64辑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文史资料. 第 64 辑 /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
ISBN 7-200-04553-5

I. 北… II. 北… III. 文史资料-北京市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00929 号

北京文史资料
BEIJING WENSHI ZILIAO
第 64 辑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 开本 9.5 印张 236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7-200-04553-5

K·479 定价: 16.00 元

《北京文史资料》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舒 乙

编委会副主任：弥松颐 贾凯林

陶信成

编委会委员：王灿炽 李 牲

李滨声 张 洁

陈平原 郑 潜

赵其昌 谢 方

蔡美彪 戴 贤

张秋萍

本辑执行编委：弥松颐

本辑执行编辑：屠剑影



· 共和国脚步 ·

1 改造·定位·创业

——记 1950·1965 年的中华书局

谢 万

· 人物春秋 ·

15 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先生

杨家翔 远泽清

41 我的回忆（节录）

赵紫宸

56 我们的父亲赵紫宸

赵萝蕤 赵景心

59 抹不掉的记忆

——怀念崔月犁同志

张廉云

64 吴其昌、吴世昌兄弟南京哭灵

吴令华

· 艺坛沧桑 ·

72 剧坛翘楚孙毓敏

刘东升 王世勋

119 北京的曲剧

路 顺

125 魔术世家

徐 秋

· 王府史话 ·

137 清朝王公府第（三）

冯其利

· 老车行 ·

185 我在“老车行”的经历

陈振坤口述 彭泽民整理

199 公私合营以前的北京汽车行

车北辙

208 三十年代北京汽车行的经营方式

吴 钢

213 “老车行”曾云集香厂路

彭泽民

· 文化轶闻 ·

- 218 那桐与“清华园”匾额 张寿崇
222 寿石工与寿星墨 张颖昭
234 西南联大教授礼赞 贺祥麟

· 史事钩沉 ·

- 240 《徐世昌日记》中的小站练兵与戊戌政变 徐定茂
259 香山脚下健锐营 白宝泉口述 白鹤群整理

· 京味饮食 ·

- 275 北京清真小吃和面点 刘东声

· 老照片 ·

- 296 慈禧太后“圣容”仪亭（3幅）
298 那桐一家（3幅）

301 编后记

改造·定位·创业

——记 1950—1965 年的中华书局

·谢 方·

中华书局成立于 1912 年 1 月的上海，是旧中国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最有影响的出版企业，迄今将有 90 年的历史。早在武昌起义前，时在商务任出版部长和《教育杂志》主编的陆费逵看到清朝行将崩溃，帝制定能推翻，学校中原有的教科书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需要大的革新，于是与友人合作，一面编写新的教材，一面筹措资金，准备成立新的书局，出版新的教科书。辛亥革命后，以出版新内容的中小学教科书为主的中华书局便应运而生。初期规模甚小，资金仅 25000 元。其后发展很快，除教科书外，还出版儿童读物、翻译读物、杂志、古籍、文学和各类专著。到 1936 年，资金已增至 400 万元。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夕，中华书局共计已出书 5700 种，古今俱备，百科兼收，为普及和提高

人民文化科学知识，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9年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全国私营书刊出版发行业进行了调整和改造。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决定出版与发行分离，中华书局将全部发行业务交给新成立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1952年，又根据出版总署关于出版社专业分工、加强领导的指示，中华书局编辑所从上海迁北京，新农出版社合并入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以出版农业、文史、俄语读物为重点。到1954年，全国进入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作为私营出版企业的中华书局董事会派出以编辑所所长舒新城、董事潘达人等5人，与公方代表出版总署的黄洛峰、金灿然进行公私合营会谈。会谈结果，中华书局总公司迁北京，与在西总布胡同7号的国营出版社财政经济出版社合并，人员不变，但对外出书仍可用中华书局名义。原财经社的狄超白为社长兼总编辑，常紫钟为副社长，原中华的卢文迪仍为副总编辑，潘达人为经理；在上海的中华书局办事处改称财政经济出版社上海办事处，有着50万册图书的上海中华书局图书馆和《辞海》编辑人员则维持旧名归上海出版局领导。从此中华书局成为国营的财政经济出版社的一部分，对外则挂财经社和中华书局两块牌子，中华书局分工出版古农书和文史读物。

但这一合并明显带有过渡性质。中华书局虽然已成为国营的出版企业，却是“寄人篱下”，它的发展前途如何，是否还能继续存在下去，仍然是个未知数。实际上在合营后的三年中，中华书局的编辑人员和出书数量都在不断的萎缩之中。原编辑所副所长金兆梓和所长舒新城已相继退休。剩下在北京搞文史的编辑寥寥无几，而且也已进入年老期，实际上只有卢文迪、姚绍华、朱彦颖、宋茂华四人。其他搞农业、俄语的编辑不久都调到农业出版社和时代出版社去了。

然而就在这仅剩四员老将的三年中，中华书局仍然坚持自己

的高质量出书的特色，出版了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文史新书。如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稿》、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陈裕菁的《蒲寿庚考》等，至今仍是文史学界常用的好书；重印书如《诸子集成》《中华二千年史》《二十五史补编》《马可波罗行纪》等至今仍经久不衰。中华书局出书的学术传统并没有因合并于财政经济出版社而消失。

二

1957年初，对中华书局前途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出现了，出版局（这时出版总署已撤销，改为文化部属下的出版事业管理局）决定将成立不到三年的古籍出版社合并入中华书局，原在财经出版社内搞文史的中华书局编辑人员全部迁入东总布胡同10号古籍出版社所在地办公。这不但使中华书局摆脱了寄人篱下的窘境，同时编辑实力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古籍出版社成立于1954年，是出版总署直属的以整理出版古籍为任务的出版社（有关该社的情况可参见《北京文史资料》第58辑王春撰写的《古籍出版社与〈资治通鉴〉标点本》一文）。这次中华与古籍合并起因，曾听到传闻说是根据毛主席指示办的，但目前找不到文字的直接依据。只有胡道静（原为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编辑，“文革”后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写的一篇《片断回忆业师陈乃乾》一文（载《回忆中华书局》1987年版）中提到说：

毛主席对出版工作规划的指示中有过这么一条，大意是说，过去有很大影响的两家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块招牌还是应当保留。顾名思义，中华就搞祖国古典，商务就搞洋古典（西洋哲社名著的译本）。这之后，北京的古籍出版社就合并入中华书局，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就合并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毛主席这一指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作出的，胡先生没有说。但很可能就是在 1956 年底或 1957 年初文化部出版局的一个关于出版社专业分工的报告上作的批示，然后才有随之而来的古籍社合并于中华书局的举措，以“保留”中华作为出版祖国古典的出版社。接着到 1958 年又明确了中华定位为出版中国文史哲古籍及其研究著作的专业出版社。可以说，毛主席的指示使中华摆脱了依附于财政经济出版社的附属地位，获得了生机。

中华书局编辑部自搬到东总布胡同 10 号大院后，不仅办公条件大为改善，拥有一座相当规模的书库，而且编辑人员无论数量上和实力都大大加强了。现在先说书库的情况，古籍出版社书库的前身是解放前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图书馆。解放后 1949 年上半年，出版总署委派金灿然到南京清点接收了这个图书馆，并将书装箱由火车运到北京，归入出版总署图书馆。到 1954 年，这批图书又分别拨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新成立的古籍出版社。其中古籍社分得线装书 15000 册，平装书 6000 册，期刊 800 册，都是关于文史方面的书。到 1956 年古籍社合并于中华后，这批图书便全部归入中华书局图书馆。再加上财经出版社将原中华的有关文史图书 4000 余册交还中华书局，这时中华书局图书馆藏书已达 32000 册，而且很有价值的线装古书占了一半。这对文史专业的出版社来说真是一笔极为难得的文化资源。

但更为重要的是编辑部实力的大大加强。一批学识深厚、经验丰富的编辑、专家进入了中华书局编辑部。原古籍社的副总编章锡琛成为中华书局的副总编，他早在上世纪的 20 年代便是商务印书馆著名编辑、文学研究会会员，后来又是开明书店创办人之一。老编辑徐调孚也是文学研究会会员，是 30 年代《小说月报》的编辑、《木偶奇遇记》的最早译者；后来加入开明书店，开明版的古典文学书多出其手，开明迁京合并于中国青年出版社，他进入中青社，1954 年调入新成立的古籍社，古籍社合并于中华后他即为古典文学编辑组组长。著名版本学专家陈乃乾原

为沪上书商，当时版本学界就有“南陈（乃乾）北赵（万里）”之称。1955年金灿然亲赴上海延聘陈老入京为古籍出版社特聘专家。当时陈老偕老伴及家中全部藏书共一车皮举家迁京，决心为新中国古籍出版事业贡献余生。由于他精通版本之学，“文革”前中华许多古籍的点校底本和参校本都是由他提供和决定的，著名的《永乐大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明经世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古本戏曲丛刊》《事林广记》等的影印，都是在他的主持和积极参与下完成的。他还无偿地捐献了许多珍藏的古籍供影印和古籍整理使用。但谁能料到，在后来的“文革”浩劫中，陈老竟是受冲击遭凌辱最严重的“反动权威”，家中所藏图书文物被抄，损失殆尽，最后又被迫离京返回浙江海宁老家，在孤独凄凉有病无人照料中辞世。

当时随着古籍出版社进入中华书局的还有张静庐（创办上海杂志公司，近代出版史专家）、陆高谊（原世界书局总经理）、曾次亮（古天文历算专家）和丁晓先、冯都良、童第德、徐寿龄、徐溥泽等老先生。解放前上海民营四大出版企业：商务、中华、世界（书局）、开明（书店），除商务外，现在中、世、开三家的负责人都聚在一起了。中华书局从“四员老将”一下增加到二十多员老将，在合并后的第一年，便出版了《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小腆纪年附考》《十三经注疏》《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等十余种好书，这充分显示了老编辑们“宝刀未老”的实力。

但当时一个明显的缺点是中青年编辑几乎没有，编辑后继乏人。在体制上中华仍是财经出版社的一部分，其行政、出版人员仍与财经结成一體。如不改变，对中华书局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到了1957年9月，这一情况开始有了一点变化。中华迎来了首批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年轻编辑，我就是在这时进入中华书局的。我们一批共四人，两人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一人是

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我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初进中华，对这里古色古香的环境充满了好奇感。编辑部在一座古老的小四合院中，同事们说的都是吴越方言，轻言细语，对人俱称“先生”，与解放后普遍呼“同志”大异。我被分配在古代史编辑组，组长姚绍华。他交给我看的第一部稿子竟是我的老师岑仲勉的《突厥集史》。我边读边学地看了约三分之一。到12月间，我和财经出版社的中青年同志一起参加了文化部组织的干部下放锻炼，到江苏六合县农村“三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去了。到次年10月才返回北京。就在我下放的这一段时间内，中华书局竟出现了一次飞跃式的转变，这就是与财经出版社的完全分离，最后完成了出版的分工和定位，从而进入了解放后创业的新时期（1958—1965）。

三

早在1956年古籍出版社的《资治通鉴》标点本获得成功并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后，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便与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金灿然，历史学家范文澜、吴晗、翦伯赞等人研究整理出版二十四史点校本的问题。在古籍出版社合并入中华后，这一出版任务就自然落到中华书局身上。1957年12月10日，齐燕铭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聂荣臻主任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建立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建议在国务院科委下成立一个古籍出版规划小组，由小组负责拟出一个全国性的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日常工作和秘书工作由中华书局担任。1958年2月，直属国务院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由齐燕铭任组长，中华书局为办事机构。这正是中华书局重振雄风的绝好机遇。于是文化部出版局迅速地调整和安排了中华书局的出书方向和领导班子，任命金灿然为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另一出版局副局长傅彬然为副总编辑。1958年3月，《人民日报》发布了

“文化部重新安排中华书局为整理出版中国文、史、哲古籍，并适当出版现代学者有关古典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著作”的消息。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也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合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北京的中华书局与财政经济出版社正式脱钩，所有中华书局的行政干部和出版、发行、总务部门全部都搬进了东总布胡同10号。

金灿然上任伊始，抓的头等大事就是《二十四史》中前四史的点校工作。首先是落实了点校人员，《史记》为顾颉刚，《汉书》《后汉书》为西北大学历史系，《三国志》为陈乃乾，并想方设法从有关单位商调适合做整理古籍的人员，加强古籍编辑力量。前一年下放到农村锻炼的同志也在这年10月返回北京。

我从农村回到北京后一踏进中华书局，就深深地感到这里正在发生的变化。过去院子内安详、恬静的环境现在充满了紧张热烈的气氛。看到了很多新面孔，而且大多是中青年。当时正处于“大跃进”初期，我很高兴看到“大跃进”也使古老的出版企业焕发了青春。使我特别兴奋的是去年我下放农村前只看了三分之一的《突厥集史》稿，现在已成书出版了。原来我走后稿件由朱彦颖接手，这位学识丰富的中华老编辑真正发挥了“大跃进”的冲天干劲，将这非常专业的80万字书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完成了从审读到加工发稿、看校样、出书的全过程。使我这初出茅庐的小子万分敬佩。

这时在古代史编辑室内我的办公桌旁边又增加了一位白发长者，他与朱彦颖先生靠窗相对，我的位置则在横头，我们三人呈小三角形。经过姚绍华先生的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久已闻名的宋云彬先生，我在解放前读中学时就常在《中学生》杂志中读到他的文章，想不到现在居然能同处一室，可以随时请教，令我高兴不已。但宋先生只对我淡淡地点了一下头，便又埋头工作。后来我才了解，他在解放初期便是全国政协委员，曾在出版总署工作，后来回到杭州，任省文联主席。反“右”时被划为“右派”，

不久前才被金灿然冒着风险把他“请”回北京，进入中华书局参加点校“前四史”工作。《史记》的点校原由顾颉刚负责，他因老病在身，由他的助手贺次君代做，但问题很多，金灿然很不满意，就请宋云彬先生在顾先生的基础上重新再点。这是1959年国庆的献礼书，所以他的工作繁重而紧迫。1959年后，他又继续投入《汉书》的复审工作和《后汉书》的全部点校工作。（《后汉书》西北大学后来无人负责，点校工作也只好全部由宋先生来做。）我与宋老同室办公三年，1961年10月中华迁西郊翠微路后，我与他始分开，受他的教益良多，可以说是他把我带入古籍整理门槛的。目睹他晚年以“待罪”之身（1962年前尚未摘去“右派”帽子），默默无闻地在埋头工作（《史记》及两《汉书》出版时书中参加标点者均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最后他在“文革”中被抄家，迫害致死。现在想起来，心中还有说不出的难过。

当时被金灿然物色进来的还有一批知名学者和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其中有两位是“宿儒”型的学者，即讲“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孙人和先生和讲“经学”的马宗霍先生，两位平常很少见面，是中华的特级顾问。其他年长而来上班的则有以先秦经史见长的杨伯峻先生、以秦汉史见长的马非百先生和以考古文物见长的傅振伦先生。在中年人中，有从中宣部调来的李佩和从商务印书馆调入的赵守俨。他们不久就分别被任命为近代史组和古代史组的副组长，成为中华书局的骨干力量。赵守俨在1959年后实际上就是《二十四史》具体工作的主持人。他本是解放前辅仁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但幼承家学，酷爱文史。他的祖父赵尔丰是清末四川总督，伯祖赵尔巽曾任清史馆馆长。中学时就读教会学校，英文很好。特别是经史校讎之学，有很深的功力，是中年人中罕见的古籍整理人才。金灿然慧眼识人，故委以重任。同时调入中华的还有一批年轻人，其中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就有程毅中、傅璇琮、李思敬、沈玉成、陈金生、褚斌杰等人，不久都成为中华书局的中坚力量。经

过金灿然一年多的努力，中华书局在 50 年代末很快就形成了一支有相当实力的老中青结合的整理出版古籍的编辑队伍。

不仅如此，金灿然和齐燕铭为了培养整理古籍接班人，还采取一项极有远见的措施，即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古典文献专业。1959 年 3 月，在古籍规划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通过高教部委请北大中文系开设古典文献专业，招生培养新人。金灿然与北大副校长翦伯赞、中文系主任魏建功等经过半年的紧张筹备，古典文献专业终于在当年 9 月开学。此后每年都招新生。这不仅解决了中华书局编辑力量后继乏人的问题，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新型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从 1964 年开始，中华书局的年轻编辑大部分都是该专业的毕业生。现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负责人杨牧之同志，就是该专业 1966 年的毕业生，在中华书局工作十多年后，才提拔上去的。

为了弥补专业编辑人力的不足，金灿然还从社会上吸收一些被“遗忘”的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以“临时工”的名义进入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工作。其中最典型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儿子王仲闻。解放前他长期在邮局工作，解放后怀疑他与特务组织有关，虽被留用，但只在地安门邮局卖邮票。其后又莫名其妙地成为“右派”，被开除公职。1959 年底这事不知怎么被齐燕铭知道了，便介绍他到金灿然处。金灿然正求贤若渴，了解到他对诗词极有研究，便请他负责复审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唐先生与王先生原有旧交，深知王先生功力，对此极表赞同。于是 1960 年王先生就干脆以“临时工”的名义来中华书局上班。他为《全宋词》做了大量的复核、改错、订补工作。1964 年此书出版前唐先生坚持要补上“王仲闻订补”的署名，但限于当时文化部制定的一个条例规定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不能在出版物署名，因而作罢。王先生在中华给人的印象始终是一位不懂世事的学者，是一位真正的“书痴”。他多年写的一本稿《读词识小》

曾请钱钟书看过，认为这是“一本奇书”。此稿本拟由中华书局出版，但接着“文化大革命”来了，王先生不能来上班，被街道监管，从此连人和稿都不知下落，奇人和他的奇书就像流星一样消失了。

从1959年到1966年间，文化部又任命了三位中华书局领导：梁涛然为副总经理，主管党的工作和行政事务；丁树奇（原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为副总编，主管各编辑室业务；萧项平（原教育工会副主席）为副总编，主管点校二十四史工作。中华书局的领导班子得到大大加强。编内人数也成倍增长，达到五十多人。

这个时期，古籍已经是成批地出版，传世的经典名著《永乐大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观堂集林》的影印本，《史记》《三国志》《明通鉴》《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国榷》《元曲选外编》《太平经合校》的点校本，和《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等丛书，都是在这时陆续出版的。一些质量很高的资料汇编，如《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等，也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这时，定位后的中华书局已从解放后呈衰退状态中苏醒过来，一跃而成为中外知名的文史研究专业的出版社了。

四

1961年10月，中华书局从东总布胡同狭小的四合院搬到了西郊翠微路2号原文化学院大楼。这里地方宽敞，办公楼和宿舍都同在一个院内，上班方便，新成立的中华排版厂也在附近，这为中华书局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前良好的条件。

这里只谈三件具体事情：

一是《文史》的创办。《文史》现在已是中华书局的名牌刊

物，但它在开始时却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因为它是一个既没有贴上马列主义标签也不谈理论的纯粹是史料考据的集刊；它用的是繁体字，可以是白话文，也可以用文言文，这些在当时的刊物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创办的起因听说是齐燕铭与周扬商量决定的，吴晗则是这一决定的坚决拥护者。具体的操作开始时是由《新建设》杂志办，后来干脆就交给中华书局编辑出版。金灿然指定由萧项平负责，由沈玉成做具体编辑工作，并特别交待：不要做宣传，不要出广告，也不要编委会、主编等，要静悄悄地进行。沈玉成就总结了这些特点，在《文史》发刊辞中用“崇尚实学，去绝浮言”作为办刊宗旨。于是解放后早已销声匿迹的乾嘉考据之学又开始登上大雅之堂了。1962年冬，《文史》第一辑出版，几乎全部都是老一辈学者多年未能发表的旧著，有陈垣、顾颉刚、游国恩、于省吾、段熙仲、朱谦之、杨宽等的文章。虽然事前没有宣传，但第一辑印数3000册很快就销售了。国内外学术界反映极好，认为它确实体现了“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文史》每年出一辑或两辑，稿件大批涌来，使编辑应接不暇。《文史》的出版，也大大提高了中华书局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不久，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也仿《文史》出版了《中华文史论丛》。《文史》在“文革”前共出6辑，“文革”后又继续出版，迄今已达46辑，成为文史学术界的权威刊物，可以做广告，做宣传，这是初办时始料不及的。

二是《二十四史》整理班子的建立并集中北京工作。1962年底，《史记》《汉书》《三国志》标点本均已出版，《后汉书》也在陆续排印之中。但以下各史，除《晋书》已基本完成点校外，其余均相差甚远，甚至还未启动。很多点校者都在外地高校，兼有教学和研究任务，也很难保证按时完成点校任务。鉴于此，金灿然便与齐燕铭商量决定打报告给中宣部周扬同志，要求把在外地承担点校《二十四史》的同志借调到北京中华书局来，集中点校工作。1963年，中宣部与高教部联合发函给有关高校借调了